

辛亥革命回憶錄

第三集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中華書局出版
一九六二年九月

辛亥革命回憶錄

第三集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民族印刷廠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經售

*

850×1168毫米 1/32·16 1/4 印張·7 插頁·361,000 字

1962年9月第1版

1962年9月 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1—8,600 定價：(9)2.40元

統一書號：11018·326 62.8.京型

目 录

- 辛亥前我参加的四川几次武装起义 熊克武 (1)
四川辛亥革命亲历記 但懋辛 (26)
忆成都保路运动 石体元 (42)
大汉四川軍政府成立前后見聞 王右瑜 (68)
重庆蜀軍政府成立亲历記 向 楚遺稿 (74)
四川辛亥革命見聞录 吳晉航 (99)
辛亥重庆光复的回忆 溫少鶴 (111)
同盟会在四川的几次武装起义 陈紹伯 (117)
記辛亥四川起义 张汝杰 张惠昌 (125)
同盟会在四川的活动 黃遂生 (129)
資州罗泉井會議与組織同盟軍 唐宗尧 胡恭先 (142)
立宪派人和四川諮議局 张惠昌 (145)
四川袍哥与辛亥革命 陈書农 (174)
内江独立前后 吳树韓 (177)
回忆辛亥革命川东綏定、东乡地区光复前后 王維舟 (185)
忠县辛亥革命的回忆 陈德甫 (190)
巫山县的革命活动 宋子然 宋子哲 吳宝秋 (196)
奉节反正的經過 政协奉节縣委員会社会人士学习小組 (203)

記崇慶一支同志軍的始末	陈师雄	(207)
同盟会与川西哥老会	王蘊滋	(218)
灌县保路同志会活动情况的回忆	罗英等	(224)
松、理、茂、汝藏族人民反清斗争	索觀瀛	(227)
大渡河、大相岭阻击清边军		
.....	吳光駿 蕭子臣 孔庆宗 楊伯謙	(230)
西昌辛亥見聞	胡恭先	(235)
自井辛亥反正見聞	楊西舟	(239)
辛亥秋鄂軍杀端方瑣記	罗任一	(242)
同盟会在叙永县活动紀实	李鉄夫	(245)
犍为同志軍見聞录	宁芷邨	(253)
大足同志軍	陈日刚	(258)
古藺县独立經過	蕭若愚 黃玉清 王堯夫	(272)
綦江县辛亥起义	政协綦江縣委員會	(279)
叙州府独立和滇軍侵占川南	賴建侯	(283)
蜀北軍政府成立始末調查記	南充师范学院	(287)
李紹伊领导大竹农民起义的經過	政协大竹縣委員會	(294)
辛亥革命前“大竹書报社”的革命活动	政协大足縣委員會	(300)
邻水县辛亥反正經過	任正格	(303)
回忆辛亥革命达县的情景	梅吉菴	(316)
东乡光复記	石体元	(319)
张百祥革命事略	杜鋼百	(329)
《重庆日报》創办人卞小吾烈士事迹	卞仲璠	(336)
辛亥革命烈士謝奉琦事略	政协自貢市委員會	(340)
清末民初四川的軍事学堂及川軍派系	張仲雷	(345)

辛亥云南反正亲历記	王冠軍	(365)
南防光复回忆录	馬竹騫	(372)
楊振鴻滇西革命紀略	何 畏	(380)
陸軍第十九鎮及云南講武堂	祝鴻基	(390)
辛亥革命前后的箇旧	张若谷	(396)
隨唐繼堯入黔忆事五則	李佩珩	(401)
蔡松坡先生事略	雷 鳩	(406)
我对蔡鍔的回忆	李文汉	(427)
忆蔡鍔	詹秉忠 孙天霖	(432)
貴州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	张彭年	(439)
貴州自治学社和宪政会的斗争	萧子有	(453)
自治学社与哥老会	胡寿山	(466)
辛亥革命时期貴州陸軍小学的一些活动	刘莘园	(479)
貴州的耆老会	严池华	(493)
魯屏周杀滇軍梅志逸見聞	杜叔机	(497)
貴州辛亥革命前后的几点回忆	阮俊斋	(502)
辛亥革命时西藏人民的祝願	喜饒嘉錯	(508)
回顧辛亥革命前后的西藏情况	桑頗·才旺仁增 朗頓·貢嘎旺秋	(510)

辛亥前我参加的四川几次武装起义

熊 克 武

(一) 我参加革命的經過

我在家乡井研念私塾时，我的老师吳蜀筹是研究历史的。他常給学生講解宋末、明末的历史，要学生抄写有关反抗元、清的文献，如《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等。我特別欢喜明末夏完淳的詩文（夏完淳死后溢“节愍”，吳老师曾将吳氏家藏的手鈔本交成都志古堂刊行《夏节愍集》），一面抄写，一面熟讀，至今还可以背誦一二。由此我获得了不少关于反抗异族的历史知識，启发了我的民族意識和爱国思想。

吳老师又常从省外游宦的亲友处得到《革命軍》、《时务报》以及庚子、辛丑的和約条款这类書刊，我很爱看，也略知列强要灭亡中国、清廷丧权辱国和民族危机的大势，更激发了我的民族义憤和爱国热情；而太平天国、义和团以及当时轟动四川的余栋臣、廖觀音等打教堂的影响，使我感到空談无益，向往于革命的实际行动，愿意献身于革命事业。

清廷停止科举，兴办洋学，成都設立了高等学堂 和东文学堂，由各县选調秀才一二人入学，“白丁”是没有資格进去的。东文学堂毕业后可送日本留学。又办了一个东游預備学堂，招收自費留

目的学生，一般人都可应考。同县王右瑜先生知道我的志向，鼓励我說：“在乡下讀書眼界不寬，应先上成都求学，如經濟情况許可，即进預备学堂，再去日本，才能大展青年的抱負。”我愿意，家里也同意，我就于癸卯（一九〇三年）春入預备学堂，是年冬即东渡日本，肄业东京大成中学。

到东京后，由于我接触爱国志士日多，又能看到进步書报，耳目一新，就更倾向于革命了。但革命應該做什么，怎么做，还是茫然。我早就听说过孙逸仙的名字，知道他是革命家，很希望有机会見到他。乙巳（一九〇五年）我和但懋辛同住神田区猿乐町四十五番地五明館，七月初岩仓鉄道学校川籍学生鄒奉先、吳嘉讚來告訴我們，該校暑期补习班翻譯程家裡昨天下課时，在黑板上写着“孙逸仙先生到了东京”几个字，我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兴奋，等鄒、吳走后，就去找程家裡打听孙先生的住址。剛好孙先生就在程的家里，我們如愿以偿，第一次會見了这位伟大的中国革命家。孙先生問及我們来日本想学什么，我們說：“打算投考陸軍学校，毕业后回国带兵，革命救国。”孙先生即指示我們：“青年人立志革命救国，很好，很好！不过列强急謀瓜分中国，清廷腐败无能，亡国灭种祸在旦夕，爱国志士应积极准备革命，以救危亡；要是都等到学成归国再来革命，時間恐怕来不及了。”我們领悟了孙先生的意思，当表示随时可以听候号召，放弃学业，投身革命。孙先生又問：“要革命就得加入革命党，你們愿意参加嗎？”我們回答：“我們今天就是为要革命而来的。”孙先生含笑点头，当时就叫我們填写誓約，过了几天正式宣誓入盟，从此开始了我們的革命生活。

八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开成立大会，时川人加盟者有数十人，选任重要职务的有：总部評議部評議員熊克武、但懋辛，执行部

書記李肇甫，四川省分會長黃樹中。我在日本的一般活動這裡不多談了，要提到的就是：不久，中山先生自橫濱來信，要總部派人去橫濱跟梁慕光學制炸彈。黃樹中、曾冠和我自願地接受了這個任務。當年國內革命，槍械是難以弄到的，主要靠大刀、梭鎲、鳥銃和土炮，而威力較大又便於攜帶的還是炸彈。梁慕光教我們用王水煮化墨西哥銀元製成的炸藥，爆炸力極猛，容易出危險，但我們都願意學好這項本領，為日後起義之用。更其重要的是，這期間我們和中山先生往來最密，受他的感化和教誨最深。我們每次去看中山先生，他總是在讀書，或者是會客，或者是洗衣褲，有時忙得一邊洗東西，一邊和我們談話。到了吃飯的時候，就在鄰近小料理店叫幾盤麪大家吃，就算一頓飯，又繼續談，一直到深夜。這種求學精神、儉朴作風、艱苦生活，使我們深為感動。先生又常為我們講述革命道理，剖析國際大勢，滔滔不絕，誨人不倦。並再三教導我們：革命是一定成功的，我輩應該有這種堅強的信心；又要有不怕失敗、百折不撓的勇氣；還必須有捨生取義、成功不必在我的精神，不如此那就不能革命了。這些是我終生難忘的訓示，也是我數十年來要求自己的準則。

同年十一月，日本文部省頒布了“取締清韓留日學生規則”，激起了中國學生的憤怒，展开了反對“取締規則”的運動。當各校代表開會討論對策時，決定全體罷課，以示抗議。而罷課後日本政府不理又該怎麼辦，會議中出現了兩種不同的主張：一種意見是繼之以全體退學；一種意見認為如果退學不能迫使日本政府屈服，那只有全體歸國，處理一萬多人回國和回國以後做什么，是個大問題，應該慎重考慮。我雖然同意後一種主張，但我還是服从退學歸國的決定，我也隨同回到了上海。結果，自費生回國的多，而官費生

却回来的较少。

集中在上海的归国学生感到：中国人除了去日本难道就不能求学？要自己办一个学堂，而且要办好；同时又可利用学堂作掩护，进行革命。于是有七十三个同学（同盟会会员占多数）每人门二十元，孙镜清捐了一笔款，在北四川路新靶子路租了一所洋房，推定张邦杰、黄兆祥、姚宏业、孙镜清、王团沙等负责开始筹办。这点钱当然是不够用的，专靠几十个学生和少数人的捐款，是无济于事的；而要把学堂办好，又非巨款不行，筹集既感困难，学校且有难以维持之势，因此姚宏业愤而投黄浦江，以死呼吁，激励了不少人慷慨捐输。后来经同志们的奔走努力，淡淡经营，终于成为有名的吴淞中国公学。

东京同盟会总部委任但懋辛和我负责往来日本、上海、内地同志的联络接洽工作。丙午（一九〇六年）春我和但懋辛奉命迎接章太炎出狱，我们问章：“你准备去哪里？”章说：“中山在哪里，我就去哪里。”我们告诉他在日本，他就到东京去了。五月，中山先生化名高野，乘法国邮船由日本经上海去南洋，约我们上船去见他，报告内地的情况。临走时，中山先生说他需要一千块钱，我们答应设法筹措，后由秋瑾送去一千元。七月，同盟会总部派我和龚铁铮（湖南人）去南京调查新军和警察冲突的案件，任务完毕返沪，但懋辛告诉我，东京派董庆伯来上海，带来总部命令，委派我和谢奉琦、黄树中为川省主盟人。我即离沪回川。

（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那时候，四川留日学生有好几百人，加入同盟会的也有百数十

人，归国后，天多數分散在省城和各县任职，他們在地方都有一定的声望、地位和影响，可以发生不小的作用。因此总部給我們的任务是：先把散处各地的同志联络好，并設立机关，吸收党员，扩充力量，作为起义的领导和骨干，然后組織学生，联合会党，运动新軍，发动起义。因为总部根据中山先生的指示：“揚子江流域将为中国革命必爭之地，而四川位居长江上游，更应及早图之”，所以把在四川发难的責任交給我們。

我首先到重庆，同朱之洪、宋紹尊、张佐丞、冉君穀、陈兴之等面談，再到成都和謝奉琦、余英（号竟成，曾去东京，中山先生任他負聯絡川云貴邊會党之責）、黃树中等面商，决定集召同志會議于成都草堂寺，到三十余人。討論起义問題时，有人認為：我們手无寸鐵，不要輕易冒险，作无謂的牺牲，主张稳健从事，等待时机。但大多数人則認為革命就要冒险，就要流血，失敗了再干，主张积极准备，准备好了就动手。于是計議分工負責，分头进行，主要的有三个方面：

1. 学界：同盟会会员和留日学生任学堂监督（校长）、教习的甚多，而学生多系富有爱国思想，易于接受革命的青年，大有发展的前途。同时，自庚子八国联軍之役后，政府提倡学生練軍事体操，有些学堂已多少領到一些枪枝，更为我們所注意，就推定黃树中、張培爵、黃金鰲、謝持、曾冠等負責策划。

2. 軍队：川省为創办新軍曾設立武备学堂，訓練军官，推选学生中同志龙光、黃成璋、王子均負責联系。又成立了一个弁目队，訓練班长級干部，推选学生中同志秦炳、姚国樑（秦、姚两同志系黃花崗烈士）、伍安全、易中、程德藩、但坚、朱灝等負責联络。那一年正值弁目队招生，規定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識，又限制只招川北人，

因为清吏認為川北人老实可靠。我們就发动了一批青年学生投考，这样同盟会在新軍基干中才有了点基础。

3.会党：四川帮会的势力很大，散布的地区也广，這是我們必須爭取的社会力量，推余英、曾省斋、黎靖瀛、余切等負責。四川帮会主要的有四部分：在重庆、泸州、叙府一带是余英的势力范围。帮会內分仁、义、礼、智、信五堂，仁字輩最大称太爷，信字輩最小。余自日本回川后，倡导“仁、义”不分上下，另創立“义会”，自为首領，声势日大。余本是有民族思想的汉子，他常在茶樓酒館公开宣讀《警世鐘》、《革命軍》，自他在东京会见中山先生付予重任后，更为积极活跃，奔走革命。这是同盟会可以直接运用指揮的一股力量。其次，以刘天成为首的刘西成、刘子成、刘炳云等一帮占据云、貴、川边境，党徒甚多，且有五子枪数十条，为当时最有实力的一部分。再有府河、銅河、雅河一带的王松廷、毛长兴，下川东一带的項大鼻子，号召力都不小，也是我們要联系的重要对象。此外，巡防軍和警察中帮会的弟兄不少，仍由余英等負責联络。

初步的全盘布置确定后，我即出发川东南重要城市，联系同志，了解情况，設立机关，发展党员，推定負責人，从事建立基础的工作。我到过成都、重庆、泸州、叙府、屏山、井研、永宁、永安等府县，詳情从略。但可以一提的，当时我化名为邱济川，为了与会党接洽方便，取得他們的信任，我在赴泸途中的白沙，由余英介紹，加入了哥老会，但未公开我的身分。泸州是我們認為可以首先发难的地区，余是泸州人，就留他主謀其事。其次，到起义前，同盟会在各地吸收了大批有声望的爱国人士，重要人物如泸州的席成元（盐商，担任筹措起义的經費）、邓邦植（宦官世家，秘密机关設在他家里，掩护党人的活动）以及黃宗幹、楊兆蓉、罗紹图，他如叙府的刘

•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永年，屏山的楊世尊、徐岱宗，榮县的黎靖瀛、邹固元、王天杰、賴君奇，井研的吳嘉讀、鄒奉先、稅鍾麟、曾濟民、陳樹嵐、陳策、陳紹伯，永寧的馬圖，永州的皮相全、黃宅安，巴县的朱之洪、冉君穀、陳興之，富順的邹丰三、曹篤、羅醒予，榮昌的胡樹文、但懋庚、楊亞东、楊群玖，忠州的吳因鴻、江曉岑、江曉嵐，涪陵的高亞衡，長壽的廖子亞、涂海珊，大竹的陳鳳石、蕭靜軒，廣安的張觀鳳、王巨淵、蔡体平、陳云九、吳夢耕、溫口隆昌的黃万里、鄭輝武、曾省齋、薛瀛海等。同盟会的实力日見增强，对于发动各次起义和辛亥革命都有很大关系。現在我开始略述各次起义的經過。

(三) 丁未江安、泸州、成都、叙府的起义

一 江安、泸州之役

丁未(一九〇七年)江安、泸州之役，是同盟会領導的首次起义。当时选择泸州为首先发难的地方，因为：1. 泸州为川南重鎮，上可进窥嘉(定)、叙(府)，下可虎視重庆，泸州得手，即可震动全省，造成革命的大好声势；2. 泸州系水陆碼头，交通便利，且又接近云南边界，进可攻，退可守，是个理想的軍事基地；3. 泸州及附近各县党人最多，容易集中，领导力量相当雄厚；4. 泸州为余英家乡，帮会实力頗强，而駐泸州的盐务巡防營和川南道巡防營，已与会党通气，可以策动內应；5. 軍事用費席成元可以大力筹助。有了这些把握，所以同志們都認為可以旗开得胜，馬到成功。

当年搞武装暴動，最感困难的就是沒有自己的军队和足够的枪弹作为起义的主力，而清軍虽然腐敗，究竟有单响毛瑟枪，总比梭标、馬刀厉害，所以运动清軍发难是我們的第一課題。駐泸州的

巡防營中雖有帮會弟兄，但同盟會人還沒有打进去作为統率的干部，而江安巡防營中有同志劉安邦、鮑九成當哨官，因此我們決定的計劃是：（1）劉安邦、鮑九成先期在江安起事，然后順流而下，攻打泸州，由余英、楊兆蓉、程德藩、趙鐵橋負責進行；（2）由謝奉琦、鄧邦植、席成元、楊兆蓉、黃宗幹、羅肇圖組織同志，并由余英召集會黨三千人，散布于泸州城內外，舉火為號，黨人和會黨分三路進攻道台、知州、都司三衙門，另一路打開城門，迎接劉、鮑部隊和城外會黨，聯繫好的巡防營起而內應；（3）余英邀約劉天成帶領所部作為外援；（4）通知成都、叙府及時響應；（5）我從東京回川時，帶回五個炸彈可以作模型，又只有我和黃樹中學過制炸藥，稅鍾麟會造彈殼，就由我們三人趕制炸彈，分送江安、泸州備用。另外，我還有一個任務，就是往來各地接洽會商、解決各項問題。根據當時雙方力量的對比，是可以一舉而攻克泸州的，因而又計劃着，占領泸州後即組織軍政府，建立四川第一個革命根據地。

最初，泸州同志計劃端午節起事，因泸州的賽龍船是有名的，遠近老百姓來看熱鬧的常是人山人海，利用這時候在城內外集合幾千人，不會引起清吏的懷疑，而且行動也很方便，是個起義的好时机。但成都方面不贊同，以時間太迫，準備不及，主張改十月初九清吏慶賀西太后壽辰時，同日並舉，泸州同志也同意了。

在準備期中，連續發生了幾件意外的事情，對於江安、泸州起義有很大的影響。第一件事：黃樹中、黃方、楊維和我在永寧興隆場黃方家製造炸藥，稅鍾麟在青山岩鑄造炸彈殼。不幸黃樹中因制藥粉入瓶失慎，爆炸甚烈，受重傷，送重慶醫治，得以不死，始改名復生。楊庶堪、朱之洪、馬圖專函密告，永宁县衙正嚴查炸案，雖未被破獲，我們即遷徙為鐵山稅尊三同志的鐵工繼續工作，然已

引起了清吏的注意。在这里，我要就便更正一种传说。据同志介绍：靠川边的云南郭家坟长官司，有个很有名气的坐地虎殷吉祥，手里有几十枝五子枪，他本人并不出門做生意，遇有官府解送盐税和地丁銀子的机会，就临时召集若干弟兄，攔路劫搶，得手后就分紅散伙。当时我們总想多弄到几枝枪，因此我和黃方、黃建勋（兴隆場的舵把子）同去找殷，了解他能喊动多少人，是否可以出力相助，或者借用些枪枝，結果沒有成功。当我们回到兴隆場时，爆炸事件已发生两天了。我看到几个資料，說我也受輕伤，其实并无其事。

第二件事：会党弟兄虽乔裝各种小商小販，但忽然增加几千人，客栈旅館都挤滿了，他們說話随便，行动又不知检点，民間已传出种种謠言，清吏自然要加紧防范。第三件事：外面謠言日多，风声日大，知州楊兆龙在衙內密布持械堂勇，邀余英进衙面商公事，阴谋捕而杀之，这是他的所謂擒賊先擒王之計。楊兆龙見余英单人独馬而来，神态自若，竟犹豫不决，不敢下手，談了几句話，就請余稍候，退与幕僚集議办法。有人說，余英敢单刀赴会，或者心中无愧，或者已有准备。他是帮会的龙头，差役堂勇多半是他的党徒，輕率从事，恐怕反迫出乱子，对上担当不起，对己也不无危险，主张慎重。这时候，某堂勇耳語余英：“大爷，水涨了！”他就乘机逃出。楊兆龙見事已敗露，即下令緝捕，形势又更紧了。加之，会党弟兄又缺乏組織紀律，各路头目也約束不了，恐日久生变，于是匆匆商决，提前于十月初一发难，密电成都同时行动。

江安遂定先一日半夜由县署刑吏戴皮举火为号，城外同志和会党即起而发难，刘安邦、鮑九成则乘机率领所部直攻泸州。不料，事前县令已得告密，火起，一面扑火，一面下令閉城，并請巡防

營統領阻擊劉、鮑兩部；同時親帶衛士搜索客店，捕殺嫌疑犯十余人（同盟會同志均脫險），並用站籠絞死戴皮父女。江安事發，泸州即閉城戒嚴，斷絕交通，禁止行人，並派隊巡查，而外援劉天成又未及時趕到，城內外待命出動的同志，彼此隔絕，無法聯絡，知大勢已去，也不敢妄動，泸州武裝起義就这样夭折了。成都方面得泸州失敗消息，密召同志急往成都，共圖大舉。我們商定余英、楊兆蓉留泸州，謝奉琦、楊世尊、劉永年留叙府作策應成都起義的準備，並由席成元籌款遣散會黨後，即分路奔赴成都。

泸州知州楊兆龍是個狡猾的家伙。他一方面看到，革命黨人仍分散於城內外各處，要鎮壓沒有力量，反可能激成事變，于己不利；另一方面，同盟會起義未成，不如若無其事，粉刷太平，因此沒有捕人殺人。但事後被害的同志還是有的，不可不記，以揚忠烈。

1.余英曾向泸州城內以洗衣為業的某寡婦借錢三百兩，作為革命軍費，約定日期歸還。她很慷慨大方的說：“還啥子！我留着沒啥用處，拿去做事嘛！”後余英被通緝，牽連到她，她就吊頸自盡，真是難能可貴。我每次想起她，敬仰之心不禁油然而生；同時也使我認識到，老百姓是歡迎革命的。記得光緒末年，民間流傳兩句歌謠：“一兩地丁加我們七錢七，九重天子滾他媽三十三。”人心背向，由此可見。

2.四川省護理總督趙爾豐前任永寧道台時，每次去巡所屬各縣常借清鄉為名，大肆屠殺。某年十二月三十夜，他坐堂清理監獄，提出全部人犯，不審不問，用紅筆一勾，一個個推出斬首。有一犯人求情：“大人恩典，讓我多活一天，算是多活一年罢！”趙不准，這位犯人厲聲指着他說：“好，我在鬼門關等你！”他這樣殺人不眨眼，川人就叫他做“趙屠夫”，恨之刺骨。劉安邦以江安失敗，甚為憤

恨，表示要痛快手一下。他就化名摸赵尔丰充戈什哈，为民除害，旋为赵左右認出系江安首犯，被杀。其他不論，这种表現革命党人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是應該表揚的。

3.刘天成从江津带大队支援泸州，来迟了一步，中途得失敗消息，他化装先行，想找我們間明情形，商議以后行动，不料到白沙被内部姓吳的出卖，为官厅所捕，解重庆慷慨就义。当陈尸示众时，一位老人前去烧香磕头，有人問：“你不怕惹祸嗎？”老者答：“他犯啥子罪，我不管，他对我有恩，我要祭他。”因为几年前，这位老者带着百两紋銀往来云貴經商，一次被人搶光，一时氣急，上吊寻死，恰遇刘天成路过，把他救活，并和同伴凑足銀子百两送他，一家人得免于飢餓。当年帮会虽良莠不齐，但专同官府作对，劫富济貧，这种綠林豪杰的俠义之风，是为人民所称道的。

二 成都之役

成都系四川省会，为一省的反动統治中心。十月初九夜（丁未，一九〇七年），总督以下大吏将集于“会府”举行祝賀慈禧寿誕的典礼，党人决乘机一举而歼灭之，占领成都，号召各府、县响应，造成全省革命的声勢。本来成都党人較多，一年来在学校中发展很快，叙属、資属等学堂学生加盟的約数百人，而泸州失敗后，多数同志又汇集于成都，会党也召集了五六千人，力量是强大的，同志們是有信心的。

举义計劃：1. 分工負責，推定各方面的負責人員：新軍由龙光、黃成章、王树槐、王資軍联系指揮，并令守卫成都軍械庫的新軍开庫夺取武器；弁目队由秦炳、程德藩、伍安全、但坚、彭正綱、易中联系指揮；巡防营和会党由余切、黎靖瀛、舒新之、张达三联系指揮；

学界及学生中同志由张培爵、黄金鳌、謝持、曾冠联系指揮；謝持、楊維、黃方和我則負联系策应各路之責。2.派朱震等四門放火为号，各路即向指定目标进攻，主要的为朝賀的“会府”，将全城官吏一网打尽。3.通知叙府、泸州及其他各地及时起事。

至期，清吏临时改变朝賀地点，并于附近临时戒严，断絕交通，而放火旋被扑灭，因而各路整装待命的同志，看不見举火訊号，听不到炸弹响声，得不到行动的命令，多候至天亮，始知事敗，乃各自分散，成都起义又这样云散烟消了。看情形，清吏是事前已得到消息，早有戒备的，不过究竟是什么人告密，以后我曾問成都的同志，又到县监中去問被捕的黎靖瀛和楊維同志，但都沒有結果。

第二天，传說党人名册已被官府搜出，将按名捕拿，风声更紧。新軍和弁目队的同志十余人，都是沒有請假、偷着出营参加起义的，当然不敢回去，紛紛逃避。十余天中，伍安全被获，解凤凰山营地杀害；党人被捕者有黃方、楊維、黎靖瀛、张治祥、江永成、王炳璋，时称六君子；所謂“首要”余切、熊克武、謝持、余英等也通緝在案；各校教师学生亦多逃走，事态严重，人心惶惶。同时，同志們又奔走求救于耆老乡紳之門，首先胡雨嵐太史挺身而出，邀集老翰林伍崧生等集議，代表省中士紳向首道賀綸夔、首府高增爵呼吁。他們說：“政治不良，青年人謀求改革，是出于爱国之心，若加以大逆不道之罪名，动輒杀人，后患将不堪設想，总以寬大处理为宜，更不必株連多人。”据說成都县知县王琰坚主格杀勿論，經胡雨嵐、伍崧生、賀綸夔、高增爵向护督赵尔丰求情，陈述利害，赵屠夫也有所顧慮，始发交承审局依法訊办，判处黃方等終身监禁，至辛亥革命成功，始由同志欢迎出獄。

在这里須予补記的：我上成都經過嘉定时，該县警察所長黃农